

无名论坛

# 在“知识流放”中吟唱

——孙越生和他的“干校诗”

李 辉

1

2

几年前,我在关于五七干校的一篇文章《旧梦重温时》中感慨过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两大社会迁徙,但知青中走出了一个个作家,知青文学由此引人注目,而五七干校的生活,除了几本回忆录外,却几乎没有产生引起轰动的作品。一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,仿佛没有在那些当事者中激起多少浪花,仿佛一夜之间轰然而起的骚动,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,趋于沉寂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,譬如年龄、环境、心情等等,两代人会有很大差异。但是,我仍然不能想像,千千万万“五七战士”,思想都已枯竭,情感都已苍白,面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惨状,面对历史困惑,他们会死一般沉默。

当然不会。顾准的思想与人格重新引起关注,证明了在那段历史的场景中,一直有着坚毅的身影在闪亮。在那些为数不多的、值得今天人们敬重和研究的前辈知识分子中,孙越生无疑有着特殊价值,值得我们重视。他对官僚政治的系统研究,他在干校期间偷偷创作的诗歌,在当代思想领域、在当代文学领域,都具有特殊的价值。

第一次知道孙越生的名字,是读了他的一篇杂文《蚯蚓现象》。1988年,他以这篇杂文获得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举办的“风华杯杂文征文”一等奖。以蚯蚓的以首生身、以身生首的生理现象,来概括中国两千年封建官僚政治,让我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敏锐与深刻。

在他看来,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是相互依存的。用他的话来说:“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,坐天下,树立起‘真命天子’的偶像崇拜和‘替天行道’的绝对权威之后,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,有了庇荫,有了保障。”那些年里对“文革”批判的文章有过不少,但还很少有像他那样以一篇千字文来对历史现象做出精粹概括的。

我认识了他,并且知道了他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弟子。他告诉我,1945年,他在厦门大学听王亚南讲授政治经济学,从此,在恩师的指导下,开始研究经济学,后又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制度。王亚南的学术名著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,当年就是由他用毛笔从头到尾誊清的。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经历,才酿就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随笔。

后来,在1993年出版的《散文与人》(邵燕祥、林贤治编)第一辑上,我兴奋地读到了

自由  
的  
合  
理  
的  
想  
法  
不  
能  
在  
世  
界  
上  
寻  
找  
到  
。 在  
家  
里  
和  
在  
工  
作  
中  
，  
成  
就  
自  
己  
的  
人  
生  
。 长  
远  
的  
苦  
累  
史  
在  
魂  
描

悬挂着几幅水彩画,画面是乡间景色。他告诉我,这些是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画的,更令我吃惊的是,他送我的一摞书中,都是与美术有关的,如《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》《巴比松派风景画》《俄国画家列宾》等,都是他翻译的。他把编选好的书稿交给我,这便是1995年出版的《历史的踌躇》一书。

他为这本《历史的踌躇》准备的代序是一首诗,这下子我才知道,他不仅画画,而且还写诗。这首诗是1972年2月为那幅水彩画《雪后初晴》而写的。画面上一排小树倔强地挺立在开始消融的雪地中。诗中有这样两段:

,  
 是 的 ;  
 中 ,  
 是 的 。  
  
 的 的 ,  
 是 的 ;  
 的 大的 ,  
 是 的 。

即便写诗,他还是表现出学者本色。他在那种特殊情形下用诗与画的形式来寄寓他的思想。第一次读这首诗和看他的画,我的确感到震动。我同他商量,从这首诗中取“历史的踌躇”来作为这本随笔集的书名。他欣然同意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名。不仅仅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绪,更是他的思想与生活的一种历史的联系。

去取书稿那天我和孙越生谈得很多。他说,他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五七干校期间。特殊环境中,学术的研究已无可能,他有一种思想的痛苦。而大自然的美丽,才让他感到真正的安慰。不仅仅画画,他还第一次写起了诗。说着,他从房间里拿出几个笔记本给我看,上面有当年的日记,有零散写下的诗句。它们中的一部分,他后来整理出来,这便是收录在后来

出版的《干校心踪》(诗配画)中的那些诗作。

他在五七干校期间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。他从来没有让沉重的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压垮。尽管他不得不和所有人一样劳动,生活的空间是那么窄小,可是他的精神却时常拥有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。他可以独自一人思考,他可以在散步田野时让思想的翅膀自由飞翔。何况,他有一支画笔,伴随画笔的还有政治诗人的思想与灵感。

我把他称作“政治诗人”,是因为他的这些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诗,几乎每首都贯穿着他的政治思考。和那些当年歌颂五七干校的诗人完全不同,孙越生从来没有在诗中陶醉于所谓的田园风光之中。即便描写风景的那些作品,其实也体现着他的批判精神。他从那些美丽的风景背后,看到了当年农村的贫困,他从芸芸众生的生活万象中,思考着分配、权力制衡、民主等政治研究的课题。他的画和诗,记录着一个学者思想与艺术的美。阅读着它们,不能不让人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身影,徘徊在历史的远景中。

#### 4

读孙越生的诗和画,总是让人感到他与所倾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颇有些相似与相通之处。也就是说,他在干校期间,能够沉静下来,不让精神陷入茫然,并拿起笔创作诗歌,与他对俄罗斯文化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入了解和体味有着直接关系。

孙越生早年喜爱美术,后来虽然改学经济和政治学,但对美术的兴趣从来没有完全消失。他学习英语、俄语,长期参与外文刊物和外国学术资料的翻译、编辑工作,业余爱好之一就是不断翻译美术方面的著作,特别是有关俄罗斯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。去世前,他先后翻译出版了《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》《巴比松派风景画》《俄国画家列宾》《列宾回忆录》等著作。列维坦、列宾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特征,无

可，可

任一家办  
又波流  
不也的  
红坦  
译

8-  
5后重  
则在干

限似  
洋

卷

可

明云

有



## 6

1997年8月,一天孙越生打来电话,很高兴地告诉我,说是他的一本《干校心踪》(诗画配)出版了,要送我。我说去取,可他却执意要送来。第二天一大早,年逾古稀、重病缠身的他,真的拿着一捆书来了。天气很热,他大汗淋漓。他一下子送给我十本,说他很乐意让我转送给可能感兴趣的人。那天他看上去很疲倦,但也很兴奋。书只印了六百册,而且是他自费的。他把书交给我,就匆匆走了。谁想到,三个月后,他就因病重与世长辞。他实在还有不少课题要做,他在1989年完成的《官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》,也一直未能出版,每想到此,便令人悲痛而遗憾。

但他毕竟留下了书稿,留下了这批干校的诗。前些日子,我仔细阅读了《官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》的手稿。在这部完成于1989年的专著中,他仍然充溢着激情,继续着在五七干校时期开始的思考。当然,更为系统,更有理论性。他的侧重点在当代社会,他的思考背景是“文革”,但是,他的眼睛注视着未来。这样的人,从来不会失望,不会冷却激情。读这样一本政治学专著,我却仍然感到了他滚烫的心。

我在那篇《旧梦重温时》中还曾经说过,在干校的知识分子,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,根据周围发生的一切,来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和无奈。于是,干校的种种,对于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承受,而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催化。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,许多干校中人,才有可能从一片懵懂中走出来,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,思索“文革”,思索历

史,从而为后来的彻底否定“文革”做了最好的历史铺垫。不同领域的人,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“文革”、对历史的反思。个人崇拜逐渐淡去,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,这样的反思,为哲学、经济学、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我们难以想像,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,“文革”后的中国,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,如此充满勃勃生机。

我在写这样一些话时,脑海里闪现出的一些身影中有孙越生鲜明的影子。如今,重新读他的诗,读他的手稿,他的身影更加清晰。

在《干校心踪》的扉页上,孙越生写了这样一句题辞:“献给在文革中受我连累而共担痛苦的家人”。其实,当他用笔写下他所有的思考的时候——无论诗还是文章,他便把一个正直、热诚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热情、人格思想献给了今天和明天的人们。

人们会渐渐认识他的价值。因他所写的一切,人们将不会忘记他。

我希望如此。也相信会如此。

定稿于1999年11月26日,北京

**【作者简介】**李辉,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(今随州市),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,现任《人民日报》文艺

任  
《文  
》《 中 》《 》《  
之 —— 》(  
)。

(责任编辑 林建法)